

## 深读·红色传奇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之七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

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几万名参加长征的男红军身上时，不足3000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却少有人提起。

有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生下孩子，生下的同时又要被迫扔掉孩子；有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与男战士一样浴血杀敌，枕着死人的头骨入睡……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当初参加长征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有的孩子，从此一辈子再没见过母亲。

读懂这些女红军，读懂这种在柔弱中迸发的坚强，才能真正读懂长征。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红军。左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琼英。(资料片)



▲参加长征的部分女战士合影。(资料片)

# 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

## ——2000余名女红军的长征历程

本报记者 任鹏

### 长征前苛刻的体检

刘英在赣南于都河畔寂静的于都县搞了几周的扩红工作了。

26岁的刘英生得很娇小，像个布娃娃。但任务还未完成，她就接到命令，赶回中央苏区报到。

大约65公里，刘英走了两天。相比几天后即将开始的长征，这“仅仅算是一次散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红军中的女人们，谁能跟大部队走，谁会被留下来？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呢？这是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一个月前，随主力转移的女红军名单已经出来了。挑选的条件只有三项：共产党员，思想上可靠；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体好，能适应艰苦环境。

100多名女红军被通知参加体检，她们第一次见到据说能照透身体的神秘的X光机。

患病、怀孕、身高不够、体重不足都是淘汰的因素，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这种挑选很残酷。跟随大部队转移，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一种安全的保证。战争环境下，这是无奈的丛林法则。

每个人的命运，因为走或者留，就此改变。

一同跟随转移的还有10名女红军，她们担任要职，也是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陈碧英没想到，自己被留下了，因为低于标准体重一斤，且怀有身孕。她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的妻子，但也只能服从安排。

月光皎洁的夜色中，30名女红军跟着大部队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和刘英同行的女人还有：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

每人带着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按规定不能超过15斤，部队配发了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

女红军并没有因为是女人而受到特殊的照顾。

长征出发过去72年后，当年中央红军队伍中的江西省委妇女干部干事危秀英发表了一篇回忆30位女红军的文章。

危秀英记得，长征中女红军要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民工的思想工作。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负责三四个担架。抬担架的民工是临时雇来的，一天一块银元。女人们不用打仗，但琐碎的工作却很多，要筹备粮食，探路，偶尔闲暇时，能享受泡脚的惬意时光。

走到1935年3月，有一次，敌人追来了，民工走散了3个。危秀英和剩下的一个民工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头。

危秀英身高不到1.5米，姐妹们开玩笑叫她“矮子”。有人形容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

在长征中，谈恋爱是违反禁令的。当时的规定是，没恋爱的不准

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

中央领导的夫人们，同样要和丈夫分开。只有周末或休息时，夫妻才能见上一面。

这是一个兼顾革命与人道的办法。

但这样的规定对23岁的康克清并不奏效。长征途中，康克清和丈夫朱德几乎没分开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并不比男兵逊色。她很少骑马，随身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支长枪，有时替别人肩扛三四支步枪。

长征结束后，她对《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 降生，意味着分离

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怀孕，产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刘英曾暗暗发誓：五年不结婚。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结婚就有可能生孩子，大麻烦会接连不断：怀孕要走路，不走路就会掉队，掉队很可能被俘虏。没有担架，没有马，肚子再大也只能自己走。

1935年3月，清晨的薄雾在山间绿树中袅袅升起时，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

这时，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

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一千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

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几个月前经过云南时，邓发曾建议妻子留在当地，陈慧清硬是没有答应。

当地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响。

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

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分离。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就做出严格规定：无论职务高低，谁也不允许带孩子行军。

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又要立

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陈慧清是不幸却又幸运的。孩子出生时，她因疼痛而昏迷了，所以不必承受母子分离的更大痛苦。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边。

之后，董振堂面对“为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仗”的埋怨，勃然大怒：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谁？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一个多月前，陈慧清的姐妹廖似光刚经历过这种痛苦。

廖似光怀孕四个多月，挺着大肚子，跟着通过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

三个月后，廖似光早产生下一个男孩，生下后立刻将孩子送给老乡收养。

这是廖似光第二次生孩子，也是第二次抛弃孩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廖似光曾有过一个女儿，但也被迫送给了人。

漫漫长征路上，仅中央红军中，就有包括贺子珍在内的5位女红军干部先后产子，没有一个孩子能随母亲前行。

就在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和丈夫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的1935年11月，她随队长征。

怀孕的李贞曾被动员留在根据地，但她哭着要求随队，保证不添麻烦。

带着身孕翻过了大雪山，走进没有干净水源的草地，李贞终于早产，还没走出草地，孩子就夭折了。

在病患摧残下，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一生未曾拥有过自己的孩子。

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跟着妈妈走完了艰苦的征途。

红二方面军出发那天，蹇先任的女婴刚满19天。因为前方传来的捷报，孩子的名字就叫贺捷生。

女婴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度过了漫长的征途，竟然没有掉队。

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长征前就有了身孕。1936年6月，姐妹二人在四川甘孜相逢，进入松潘草地第一天，一个天色突变的晚上，蹇先佛临产了。

这两个母亲，怀里抱着年幼的孩子，一路走到陕北。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伟大的母爱。

这两位坚强的女红军，姐姐是贺龙的夫人，妹妹是萧克的妻子。

### “五百农妇缴一团”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

就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不久，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队伍中女红军已经超过2000多人，被整编为妇女独立师。

很多女红军曾是受尽欺负的童养媳，当上红军后，她们见到了

人生中最惊奇的事情：男女平等。

女人在困境中迸发出的力量，有时比男人还大。

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第1团团团长、政委。这个美丽女人，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三年前，她已经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女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不久前，川军一支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行周旋，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

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在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70多年后，四川省小金县93岁的女红军安秀英还能哼起这首红军歌曲。

但安秀英的命运却在长征途中转了个弯。

安秀英还记得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战役。她跟着妇女独立师参加了攻打剑门关的战斗。激战两昼夜，二十岁左右的女红军们用乌泥涂脸，不蓄头发，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绑绑带，英姿飒爽，俨如男兵。

接下来的遭遇战中，安秀英的右小腿被两颗子弹打穿，卫生员用刀子划开伤口将子弹取出来。几十年后，这处伤口还经常疼。

伤好后，安秀英再也没有联系上部队，从此过上普通农妇的生活。直到1984年，安秀英被证实为“流落红军”。

1935年6月，刘英随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长征的终点，红四方面军的张琴秋和姐妹们却迎来一次大战。

红四方面军需要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但必须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

妇女独立师下面的一个团承担在正面进攻中担任后卫的任务。

腊子口是甘南门户，地势险峻。女红军和500多名伤病员被堵在峡谷之中，不突击就可能被围攻。一个连的女红军身背大刀，手握步枪，向敌人发起进攻。断后的一个排与100多敌兵展开了肉搏。刺刀的寒光闪烁，身体的鲜血喷涌。

血战之后，红军伤员安全通过腊子口，女红军牺牲了70多人。

出腊子口那天，雨下得很大，草地上到处都是渗出的水，没法躺着睡觉。疲惫的张琴秋找了一块石头迷迷糊糊睡到天亮。醒来一看，她枕了一晚上的竟是死人头。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到1936年年初翻越党岭雪山时，当初的2000多名女红军只剩下1000多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